

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壹 “葛洲村有中国山水画的感觉”

羊城晚报:时隔40年重游葛洲村,你的感受如何?

严浩:葛洲村的变化非常大,一张桌子那么窄的小巷里,一侧是新房子,一侧是老房子。以前的葛洲村很像一幅古朴的山水画,但现在是一种身处时代变化的感觉。

我们当年拍了一场淋雨戏,没想到这场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连接时空的符号。向导说,他在9岁那年看我们拍戏,现在快50岁了,他还把我们带到当年他被淋湿的地方。我们还遇到一个80岁的老太太,问她还记得《纸蝴蝶》(《似水流年》原名)吗?她说记得,那年她40岁,那场雨淋了她一身。这个老太太还从家里翻出一个大黑锅,电影里有一幕拍了很多村民在河边洗锅,她的婆婆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锅现在已经破了一个大洞,这也是时间留下的痕迹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选择在葛洲村拍摄?

严浩:我在开拍前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美学方向,希望拍出中国山水画的感觉。来到葛洲村勘景的时候,我看到傍晚炊烟升起,云彩也来了,这一切看起来都是

贰 “人生就是又恨又舍不得”

羊城晚报:《似水流年》是改革开放后首部全程在内地取景的香港文艺片,可以谈谈当时合作的过程吗?

严浩:当时我们请新华社帮忙联系到珠江电影制片厂,老厂长洪道帮我找了孔良。为什么要找他?是因为我没有内地农村生活经验,但他长期参加农村生产劳动和下乡演出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合拍,我感觉他对生命的思考是比较超脱的。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就把剧本谈好了,这是我做得最快的一个剧本。

羊城晚报:写剧本的过程中,两人在视角和观点上发生过什么碰撞吗?

严浩:当时我代入珊珊视角,他代入阿珍视角,一讨论,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就出来了。我们把阿珍设定为一个小学校长,她经常说一些很有时代特色的话,比如我们学校是个怎样怎样的模范学校、我们家是最和谐的家庭等等。香港不会讲这些。这是那时候香港和内地的差异。

另外就是男女之间的话题。香港人聊这些就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,但如果我跟孔良聊,他会不好意思。我们把这种差异放到珊珊和阿珍上,我故意让珊珊多讲,阿珍看上去不好意思,但心里是高兴的。阿珍由此发现自己跟孝松的感情好像越来越疏离,是因

时隔40年,受潮汕地区影展——观潮影展的邀请,中国香港导演严浩与他的代表作《似水流年》再次回到汕头。8月12日,严浩重回影片的拍摄地——葛洲村,又在当晚的展映活动中与年轻观众面对面交流。

《似水流年》诞生于1984年,是32岁的严浩为了纪念逝世的父亲而拍的作品。他把自己对父亲的思念融入这个乡情故事中。影片讲述在香港生活多年的珊珊(顾美华饰)为祖母奔丧而回到阔别多年的潮汕老家,与儿时好友阿珍(斯琴高娃饰)、孝松(谢伟雄饰)夫妇重逢,影片从三人的感情纠葛中探讨内地和香港的差异,折射出两地延绵不断的血脉乡情。这部影片尝到了改革开放后内地与香港合拍模式的“头啖汤”,由香港青鸟电影与珠江电影制片厂等粤港两地电影机构共同出品,全程在汕头濠江葛洲村取景。

在香港,《似水流年》引起巨大共鸣,最终以40万港元的成本,收回450万港币的票房。在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斩获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剧本、最佳女演员、最佳新人、最佳美术指导6项大奖。

40年过去,《似水流年》仍然常看常新。“观众好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,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,他们都没还出生。一个讲到人们心里去的故事是有生命力的,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有人想去看。”严浩感叹。

严浩：《似水流年》讲的是时间的流逝



四十后再回拍摄地汕头参加影展



珊珊(顾美华饰)的回乡之旅也是一场自我探寻之旅



珊珊的到来打破了阿珍(左,斯琴高娃饰)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



《似水流年》用诗意的镜头描绘朴素的乡间生活

叁 “金庸看出了我还没意识到的东西”

羊城晚报:你说过,拍《似水流年》的直接原因是父亲去世,引起了你对生命意义的思考。

严浩:是的。爸爸走得很早,才63岁,我现在的年纪已经比他大了。他去世后,我内心涌现出一大堆关于生命的谜题:人为什么要活着?生命有什么意义?我想把这种迷茫拍成电影。

影片原本叫《纸蝴蝶》,《似水流年》是金庸先生取的。这个名字太好了,他看出了当年的我还没意识到的东西。这部电影的镜头基本是不动的,景物也是不动的,只有人物不断变换,跟生活一样。拍摄的时候,我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,如果你在40年前问我对《似水流年》的感受,我只能说我

肆 “香港电影太习惯把自己类型化了”

羊城晚报:虽然你在香港出生和成长,但大部分电影拍的都不是香港故事。你似乎更喜欢拍内地,甚至内地农村的故事。为什么?

严浩:为什么我不想拍香港的题材?因为单一。很多题材重复又重复,我没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创新。而且我不喜欢拍犯罪题材,不是说这个题材不好,而是我自己拍不出来。我是个喝水的人,你让我喝酒,我没办法喝下去。

我希望可以拍一些比较宏大的,涉及命运、人性的东西。比如我拍《太阳有耳》,当时莫言帮忙写了个故事大纲,我跟朋友把剧本完善好。故事讲述一个土匪越做越大,把别人老婆抢回来了;这个女性发现土匪越来越暴戾,丧失人性,终于有一天,她用暴力把这个土匪杀掉。这是一个关于“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”的故事。像这种题材,在香港就不好拍。

羊城晚报:这种题材偏好,是否源自你从小阅读习惯?

严浩:是的。我读很多小说,像《欧阳海之歌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等。小说里的世界爱讨论人性和命运。小时候最大

伍 “新片《留芳颂》还在寻找投资”

羊城晚报:香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新晋导演,你有关心他们的作品吗?

严浩:我看过部分作品。我觉得他们跟香港以前主流的导演不一样。比如翁子光,他会更注重电影语言的表达;又比如贾胜枫的《流水落花》,这是一部深刻地讲人情、感情的电影,这种作品以前不太受重视,但现在起码在业界成了焦点。这都是非常好的,社会进步了,观众也进步了。

羊城晚报:你对青年导演有什么建议?

在怀念爸爸。但后来随着经历渐长,我终于明白自己想表达的是时间的流逝。

羊城晚报:你的父亲严庆澍是非常有名的作家,你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?他影响了你什么?

严浩: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背影。他在报社上班,每天我们还没起床他就去上班,下班回来还要写一万字,一年只放三天假。他很辛苦,要养我们八兄弟姐妹,还要汇钱回江苏老家接济亲人。我总是看到他写稿的背影,还有他的烟灰缸和茶杯。我看见烟灰缸的次数比看见他的脸还多。他对工作的投入影响了每一个兄弟姐妹。我们都不需要父母唠叨,大

家都很自觉做作业。

羊城晚报:你父亲支持你进入电影界吗?你在1978年执导了首部电影《茄喱啡》,这部电影也被视为香港新浪潮的开端,他对此有什么评价?

严浩:父母从来没有要求我要读什么大学、学什么专业,从来不给我不压力。后来我说想做导演,父亲就说“好呀”。《茄喱啡》是1978年香港票房榜第九名,排在我前面的都是许冠文、成龙、洪金宝等大明星,但《茄喱啡》从导演到演员都是新人,成本又低,这个成绩非常好。我带父亲去电影院看这部戏,前面有两个观众老是说话,我跳起来大喊:“你们别吵!”没想到反而把我爸吓了一跳,但对方无动于衷。

他们如何为内地故事提供新的视角?

严浩:香港电影有国际化的传统。以前香港电影没有内地市场,我们要把片子卖到东南亚、韩国、日本,甚至欧美,这都是文化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国际化的角度去审视我们讲故事的方法,到底不同文化的人是否能看得懂?

电影是国际语言,也是年轻人的语言。我们应尽可能用全球的人都听得懂的方法来讲故事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得高一点,这样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。

羊城晚报:内地已经成为香港电影的重要市场,对香港导演而言,要如何找到内地和香港的连接点?

严浩:《似水流年》,我用了个平视的角度来处理两地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戏剧性,看起来很自然,观众容易接受。我觉得导演要多多观察生活,多多发现文化差异,并将其融入情节里。打个比方,拍香港人和内地人是好朋友,并不是说一起喝个酒,一个人讲广东话“干杯饮胜”,另一个讲普通话“哥们喝酒!”就算是展现出来,这很肤浅。

就消失了,这就像生命中的无奈,时间会把一切抹平。

羊城晚报:观众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新作品?

严浩:我的确正在推进一个片子,暂名《留芳颂》,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故事,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故事是很感人的,有悲壮的部分,也有诙谐的部分。我对剧本很有信心,相信这会是一个受到年轻人喜爱的故事。电影局已经通过了,现在在找演员和投资,但找投资这件事真的非常难,我还在努力推动中。



故地重游,严浩不禁感叹葛洲村变化之大